

# 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 ——基于收入分配与需求侧管理的视角

秦路平 秦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卡莱茨基主义学派基于凯恩斯-卡莱茨基有效需求原则，运用阶级分析法构建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强调收入分配对有效需求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更进一步地，通过考虑国外市场、技术进步内生因素，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指出了国内需求体制与总需求体制的区别，并强调劳动生产率提高情形下工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能够为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更好地完善需求侧管理、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动态平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提供有益指导。

**关键词：**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 经济高质量发展 收入分配 需求侧管理

**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交办项目“推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2021-034)。

### 一、引言

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的理论基石是有效需求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卡莱茨基和凯恩斯分别独立提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近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卡莱茨基主义学派，在卡莱茨基-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法构建了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

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中所包含的经济思想，如收入分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影响国内经济形势等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低速增长，增长目标也逐渐转变为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该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注重需求侧管理等改革手段。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中的若干基本内容及经济政策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诸多契合之处，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本文具体介绍了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及理论特色、增长政策及现实意义这两个方面，并着重考察这一增长理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二、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及其理论特色

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及增长模型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 初步建立阶段，罗桑<sup>[1]</sup>、达特<sup>[2]</sup>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构建标准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2) 成熟阶段，巴杜里和马格林<sup>[3]</sup>提出“巴杜里-马格林模型”，逐渐成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分析增长问题的一个标准范式。本文主要以“巴杜里-马格林模型”为研究对象，该模型包含以下几个基本内容。

(一) 需求驱动型增长理论：收入分配制度与两种需求体制

不同于凯恩斯，卡莱茨基及卡莱茨基主义学派认为，实际工资率或工资份额不是一个纯粹内生性变量。他们强调，在垄断竞争背景下，工资份额取决于垄断程度、阶级力量对比、收入分配政策等因素。在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中，劳动力被认为是唯一的生产性投入要素，且在任何给定的货币工资率上，边际平均成本不变。因此实际工资率可以表示为：

$$\frac{w}{p} = \frac{1}{(1+m)} \cdot y \quad (1)$$

其中， $w$  为货币工资率， $p$  为价格水平， $m$  为成本加成率，取决于垄断程度，也会受到工会力量大小的影响， $y$  是劳动生产率。根据 (1) 式，可以进一步得到实际工资率与利润份额之间的关系：

$$\pi = 1 - \frac{w}{p} \cdot \frac{1}{y} \quad (2)$$

其中， $\pi$  为利润份额，且  $\pi = m / ((1+m))$ 。根据 (2) 式，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时，实际工资率与利润份额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当实际工资率提高时，利润份额会降低，并对有效需求产生两个矛盾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人的购买能力刺激消费需求（“需求效应”），另一方面则通过提高单位生产成本抑制投资（“成本效应”）。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需求体制就是“工资引导型需求体制”，反之则是“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此外，由于收入分配会通过有效需求渠道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存在两种与需求体制对应的增长体制：如果工资提高能够提高增长率和利润率，就是“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反之则是“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

对上述两种需求体制和增长体制的判定，可以通过数理模型表述。在“巴杜里-马格林模型”中，投资取决于产能利用率（ $u$ ）和利润份额，储蓄与资本家储蓄倾向（ $s$ ）、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资本产出比（ $k$ ）正相关。因此，投资函数和储蓄函数可以分别表示为：

$$\text{投资函数：} g^i = \frac{I}{K} = i(\pi, u) \quad (3)$$

$$\text{储蓄函数：} g^s = \frac{S}{K} = sr = s\pi u k^{-1} \quad (4)$$

对需求体制的判定取决于收入分配变动对均衡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即考察不等式 (5) 的符号：

$$\frac{du^*}{d\pi} = -\frac{su^*k^{-1}-i_{\pi}}{s\pi k^{-1}-i_u} >, < 0 \quad (5)$$

若不等式 (5) 的符号为负，即工资份额提高会提高有效需求，进而提高均衡产能利用率和均衡产出，则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需求体制”，此时利润份额下降。若不等式 (5) 的符号为正，即工资份额下降会提高有效需求，进而提高均衡产能利用率和均衡产出，则需求体制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此时利润份额上升。

对增长体制的判定则需要考察收入分配变动对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即考察不等式 (6) 的符号：

$$\frac{dg^*}{d\pi} = i_{\pi} + i_u \cdot \frac{du^*}{d\pi} = \frac{sk^{-1}(i_{\pi}\pi - i_u \cdot u^*)}{s\pi k^{-1} - i_u} >, < 0 \quad (6)$$

若不等式 (6) 的符号为负，增长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反之则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

对比不等式 (5) 和 (6) 可以发现，存在以下 3 种劳资关系：当凯恩斯主义稳定性条件成立时，(1) 如果满足  $su^*k^{-1} - i_{\pi} > 0$ ，且  $i_{\pi} \cdot \pi - i_u \cdot u^* < 0 < s\pi u^*k^{-1} - i_u \cdot u^*$ ，那么一定有  $du^*/d\pi < 0$ ， $dg^*/d\pi < 0$ 。当工资份额提高时，不仅均衡产能利用率和均衡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也提高。因此，尽管利润份额下降，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并未完全损失，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合作关系；(2) 如果  $su^*k^{-1} - i_{\pi} > 0$ ，且  $0 < i_{\pi} \cdot \pi - i_u \cdot u^* < s\pi u^*k^{-1} - i_u \cdot u^*$ 。此时工资份额上升尽管提高了均衡产能利用率和均衡产出水平，却降低了增长率和利润率，损害了资本家阶级的切实利益，此时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3) 如果  $su^*k^{-1} - i_{\pi} < 0$ ，那么一定有  $du^*/d\pi > 0$ ， $dg^*/d\pi > 0$ 。若工资份额提高，均衡产出水平、增长率和利润率均会下降，此时资本和劳动之间依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根据收入分配对产出和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讨论了两种需求体制和两种增长体制。该模型一经提出，就被诸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因为它基于包含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的投资函数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结果，且与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模型相兼容，并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

(二) 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国内需求体制与总需求体制

卡莱茨基<sup>[4]</sup>强调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其他部门保持不变，出口余额的增长将增加利润。这显然是正确的，因为贸易余额必然会对国内收入分配，进而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当考虑开放经济时，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变为：

$$I + X = S + M \quad (7)$$

其中， $X$  为出口总额， $M$  为进口总额。令  $v$  为名义汇率，

为实际汇率(=vp<sub>f</sub>/p<sub>a</sub>)，p<sub>a</sub>为国内实际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价格指数，p<sub>f</sub>为以外币衡量的外国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u为进口倾向，因此有M=uq，其中q为实际产出。则(7)式可以变换为：

$$p_a I + p_a X = s\pi p_a q + v p_f M = s\pi p_a q + v p_f \mu q \quad (8)$$

根据(8)式，得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实际产出与实际利润量分别为：

$$q = \frac{I+X}{s\pi+v_r\mu} \quad (9)$$

$$P = \frac{I+X}{s+v_r\mu/\pi} \quad (10)$$

根据(10)式：(1)在开放经济中，收入分配变化会影响实际利润量，具体表现为利润份额下降会导致实际利润下降。而在封闭经济中收入分配变化并不会改变实际利润量，因为P=I/s。这表明，与封闭经济相比，开放经济中劳资关系倾向于冲突；(2)在给定进口倾向时，更高的出口产生更多的利润。为了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量，企业有压低工资的动力。而降低工资份额本身也是提高利润份额和实际利润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开放经济中企业具有压低工资的双重动力<sup>[5]</sup>。

此外，开放经济中收入分配变化对产出和增长率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因为贸易余额、汇率变动等因素都会影响收入分配变动产生的效应<sup>[6]</sup>。在开放经济中，实际工资率及其与利润份额之间关系的表达式由公式(1)和(2)分别转换为：

$$\frac{w}{p_a} = \frac{1}{(1+m)} \cdot y - \frac{v p_f k_m}{p} \cdot y \quad (11)$$

$$\frac{w}{p_a} = (1-\pi) \cdot y - \frac{v p_f k_m}{p} \cdot y \quad (12)$$

因此，在加价率保持不变时，汇率上升会导致本国实际工资率下降，但对利润份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新的产品市场均衡公式(7)，可以得到汇率变动对国内需求体制的影响：

$$du = [D^{-1}(i_\pi - suk^{-1})d\pi] + [D^{-1}\epsilon u(n_x + n_m - 1)(dv_r/v_r)] = A + B \quad (13)$$

其中，D=εu+sπk<sup>-1</sup>-i<sub>u</sub>，ε为进出口占产出的初始份额，只要凯恩斯主义稳定性条件成立，D>0就一定成立。n<sub>x</sub>、n<sub>m</sub>分别为出口价格弹性和进口价格弹性。(13)式右边第一部分(A)表示名义汇率变动通过利润份额变化对产能利用率产生的影响(“收入分配效应”)，其正负与国内需求体制密切相关；第二部分(B)则表示名义汇率变动通过实际汇率变化对贸易均衡产生的影响(“贸易效应”)，只要满足“马歇尔-勒那条件”，即满足

n<sub>x</sub>+n<sub>m</sub>>1，“贸易效应”就为正。

因此，(13)式整体的符号就取决于A的符号：当时，国内需求体制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名义汇率上升本币贬值，由此导致的更低的实际工资和更高的利润份额会刺激本国有效需求进而提高产能利用率。伴随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n<sub>x</sub>和n<sub>m</sub>不断提高并大于1，开放经济也表现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的特征。当A<0时，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需求体制”。此时名义汇率上升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贸易效应”的正向影响最终会抵消“收入分配效应”的负向影响，并最终使表现为“工资引导型需求体制”的经济体在开放经济中转变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此时，提高实际工资率对国内经济的有利影响被扭转。而当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利润引导型总需求体制”的特征，并因此大范围实行减薪的增长策略。但是，“多边减薪对收入分配的累退效应很可能导致世界范围内需求下降和就业萧条”，因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封闭经济表现出“工资引导型”的特征<sup>[7]</sup>。

在开放经济中，经济体在选择增长策略时应更加谨慎：在考察实际工资率变动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时，还应注意本国实施这样一个增长策略对贸易伙伴及全球经济的影响<sup>[8]</sup>。

(三) 技术进步、增长与失业：工资提高与就业变动

近年来，卡莱茨基主义学派尝试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增长与分配模型中以研究收入分配变动对供给侧因素的影响。以那斯迪帕德和斯托姆<sup>[9]</sup>为代表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的研究着眼于劳动生产率，依托卡尔多-凡登定律，建立了技术进步、总需求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式，并构建了包含技术进步的卡莱茨基主义增长与分配模型。在该模型中，劳动生产率是内生决定的，并直接取决于(工资或利润引导的)需求和实际工资率，即：

$$\hat{y} = \beta_0 + \beta_1 \hat{g} + \beta_2 \hat{\omega}, \quad \beta_0, \beta_2 > 0; \quad 0 < \beta_1 < 1 \quad (14)$$

其中， $\hat{y}$ 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hat{g}$ 为产出增长率， $\hat{\omega}$ 为实际工资率增长率( $\omega = w/p$ )。系数代表卡尔多-凡登效应：产出和需求的的增长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系数则代表马克思-韦伯效应，也被称为“工资成本诱导的技术进步效应”：更高的工资成本会引致更高的生产率增长。将(14)式纳入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就可以考察工资增长、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些相关关系的考察建立在以下方程组之上：

$$\hat{g} = \eta_0 + \eta_1(\hat{\omega} - \hat{y}) \quad (15)$$

方程组 (14) - (15) 构成一个包含技术进步的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其中, (15) 式为产出增长率方程,  $\eta_0$  为自主需求增长系数,  $\eta_1$  则反映了需求体制: 若  $\eta_1 > 0$ , 则实际工资的增长会提高产出增长率, 表现为工资引导型需求体制; 反之则表现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联立方程组 (14) - (15), 可以得到产出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的均衡值:

$$\hat{g}^* = \frac{\eta_0 - \beta_0 \eta_1}{1 + \beta_1 \eta_1} + \frac{\eta_1(1 - \beta_2)}{1 + \beta_1 \eta_1} \hat{\omega} = C + D \hat{\omega} \quad (16)$$

$$\hat{y}^* = \beta_0 + \beta_1(C + D \hat{\omega}) + \beta_2 \hat{\omega} = \beta_0 + \beta_1 C + (\beta_1 D + \beta_2) \hat{\omega} \quad (17)$$

其中,  $C = (\eta_0 - \beta_0 \eta_1) / (1 + \beta_1 \eta_1)$ ,  $D = \eta_1(1 - \beta_2) / (1 + \beta_1 \eta_1)$ , 且只要存在内生技术进步效应 (即满足  $\beta_2 > 0$ ;  $0 < \beta_1 < 1$ ,  $D$  的符号仅仅取决于  $\beta_2$  的符号。可以发现, 产出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均衡值均受制于实际工资增长率。因此, 内生技术进步对分配与增长关系的影响如下:

(1) 内生生产率增长并不改变经济系统本身的性质——即使考虑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也只能是需求驱动的, 但它会影响工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积极 (或消极) 效应。如 (16) 式所示: 实际工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只取决于  $\beta_2$  的符号, 但若“工资成本诱导的技术进步效应”足够大, 即满足  $\beta_2 \rightarrow 1$ , 则  $D \rightarrow 0$ , 此时实际工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减弱并趋于消失。也就是说, 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实际上高估了工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积极 (或消极) 效应。

(2) 实际工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 并进一步引向产出和需求。(17) 式中系数  $(\beta_1 D + \beta_2)$  反映了工资变动的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则通过工资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传递。若  $\eta_1 > 0$ , 则有  $(\beta_1 D + \beta_2) > 0$ ,  $d\hat{g}^*/d\hat{\omega} > 0$ 。因此在工资引导型体制经济中, 降低实际工资率总是会抑制长期生产率增长, 且这一抑制效应显然大于工资下降对产出增长的抑制效应, 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就业率增长率公式可以看到:

$$\hat{e} = \hat{g} - \hat{y} \quad (18)$$

其中,  $e$  为就业率。(18) 式表明, 就业增长受到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限制, 而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均取决于实际工资率的变动。因此就业率显著地受制于工资变动。根据方程组 (16) - (17), 可以求出均衡就业率增长率:

$$\hat{e}^* = -\beta_0 + (1 - \beta_1)C + [(1 - \beta_1)D - \beta_2] \hat{\omega} \quad (19)$$

则实际工资率对均衡就业率的影响表示为:

$$\frac{d\hat{e}^*}{d\hat{\omega}} = (1 - \beta_1)D - \beta_2 = \frac{(1 - \beta_1 - \beta_2)\eta_1 - \beta_2}{1 + \beta_1 \eta_1} \quad (20)$$

根据 (20) 式, 当  $\eta_1 > 0$  时, 只要  $\beta_1$  和  $\beta_2$  的值足够大, 即技术进步效应足够大,  $d\hat{e}^*/d\hat{\omega}$  就会小于零。因此工资引导型经济体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业增长率下降。而当  $\eta_1 < 0$ , 即当经济体表现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时,  $d\hat{e}^*/d\hat{\omega} < 0$  总是成立的。因此在利润引导型经济体中, 限制实际工资在提高就业增长率和降低失业方面总是有效的。但要注意的是, 这里创造更多就业是因为生产率增长率下降而不是产出增长率提高。也就是说, 限制实际工资在提高就业的同时也阻碍了经济体中的生产率增长和技术活<sup>[10]</sup>。

### 三、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的理论价值

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其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 索洛通过引入总量生产函数解决了哈罗德主义不稳定性问题, 同时构建了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随后经过拉姆齐模型对消费内生化和资本积累问题以及罗默和卢卡斯对内生增长理论的阐述, 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日益完善, 并长期占据增长理论的主流地位。但是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 具体表现在: 第一, 坚持萨伊定律, 将经济增长完全归因于供给侧的要素投入增加与技术进步, 否认有效需求对增长的拉动作用。第二, 分配问题只占据次要位置, 且完全内生。因为在一个完美的竞争模型中, 收入分配被假定由边际生产率关系调节, 工人工资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基于这种分析范式, 当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实际工资率上升时, 利润率和增长率下降。此时企业会迅速进行新技术选择, 并扩大劳动需求, 从而降低实际工资率提高利润率。因此, 在新古典主义看来, 降低实际工资率是提高增长率和扩大就业率的有效方式。

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不同, 卡莱茨基学派基于有效需求原则重点关注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形成了另一条研究路径: 第一, 坚持凯恩斯定律并将其拓展到长期, 认为即使在长期也是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相反, 因此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 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保持一致; 第二, 认为收入分配的决定并不是纯粹内生的, 它会受到一系列外生因素的影响, 并通过储蓄率内生化的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联系

起来——收入分配调整储蓄率以实现储蓄等于投资，若现实收入分配制度导致储蓄小于投资，则长期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并导致失业；第三，供给侧因素，尽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作用，但决定经济增长的是需求侧因素，由供给侧因素决定的潜在产出会向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实际产出水平调整，并最终形成与需求相匹配的水平。基于这一分析范式，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得出了与主流增长理论截然不同的观点：一定条件下，增长目标与工人工资提高并不矛盾，且实际工资提高可以实现高增长率。

近年来，这一增长理论受到了非主流经济学的关注，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斯拉法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诸多学派都对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四、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的现实意义及其对中国需求侧管理的启示

##### （一）现实意义：增长策略选择

许多学者利用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中国的需求体制和增长体制，并据此提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增长策略：

第一，收入分配是复杂社会经济过程的结果，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会显著影响收入分配结果。因此需要选择与本国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增长策略：当经济体表现出“工资引导型需求体制”的特征时，应当实行有利于工资的收入分配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等，这一增长策略也被称为“工资引导型增长策略”<sup>[11]</sup>。而当经济体表现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的特征时，则应当实行有利于利润的收入分配政策，如灵活劳动力市场、工资节制、取消最低工资等。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sup>[12]</sup>发现，大部分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国内需求体制都是工资引导型体制，因此实施“工资引导型增长策略”是实现增长的一个可行策略。

第二，尽管贸易余额增加是实现利润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是一个长期战略性增长策略，因为所有国家不能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因此应当重视本国国内需求扩张在实现高增长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出口扩张是实现本国利润增长的重要方式，且伴随开放程度的提高，一国的总需求体制越来越表现出“利润引导型需求体制”的特征，但实施如减薪、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度等亲资本的收入分配政策却不是实现国内高增长的长久性策略。

第三，工资引导型经济体中实施“工资引导型增长策略”可能面临就业增长下降问题，需要辅以恰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保证就业率。就业率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削减工资率就可以实现失业率下降——是正确的：因为削减工资率所实现的失业率减少是以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为代价的。因此当面临就业增长下降的问题，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实施适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更多地将政府资金投入扩展到扩展型投资项目中以改善投资结构和就业结构、增加基础性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需求等<sup>[13]</sup>。

##### （二）对中国需求侧管理的启示

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基于卡莱茨基-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且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显著的亲缘性。而它所包含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制度要适应经济增长体制”、“国内需求体制不同于总需求体制”等经济思想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加强我国需求侧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在加强需求侧管理过程中要坚持共同富裕目标，着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求收缩的压力要求不断加强需求侧管理，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安排。国内需求包含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但现阶段这一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需要加强需求侧管理，并将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第一，要努力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需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同时通过宏观调节扭转资本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长率远高于劳动所有者收入的增长率的现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第三，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其次，需求侧管理的工作重点应从“总需求管理”转变到“需求侧管理”，即更加重视国内需求的扩张。总需求管理强调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

手段对需求总量进行逆周期调节以稳定经济波动：当总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居民消费、投资等国内需求并有效增加出口，从而同时调节内需和外需数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着眼于短期逆周期调节的管理手段<sup>[14]</sup>。而需求侧管理则更强调以内需调控为主，主张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全球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重视扩大国内需求加强需求侧管理，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同时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变化。

最后，在加强需求侧管理过程中要注意扩大就业问题，这需要将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卡莱茨基主义强调，实施有利于工资的收入分配政策可能会带来就业增长率下降，但削减工资率并不是降低失业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会导致生产率增长率下降，进而削弱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最有效的方法是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协调配合：一方面积极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产能转移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要求我国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强化就业培训系统的建设，引导并帮助就业者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引导投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新基建建设（如5G建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等）以吸引更多劳动力进入，进而有效扩大就业。NE

#### 参考文献

- [1] Rowthorn, R.E. Demand, Real Wages and Growth, Thames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Autumn, 1981.
- [2] Dutt, A.K. Stagnation, income and monopoly power[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1):25-40.
- [3] Bhaduri, A., Marglin, S.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of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4): 375 - 93.
- [4] Kalecki, M., "on foreign trade and 'domestic exports'", in Kalecki, M., Selected Essays i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5-25.
- [5] Lavoie, M.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foundations[M]. 2014:360.
- [6] Blecker, R.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3(3), p,406-407.
- [7] Blecker, R.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3(3), p.407.
- [8] Lavoie, M., and Engelbert Stockhammer, Wage-led growth: concept, theories and policies,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No.41, ISSN 2226-8944, p.15.
- [9] Naastepad, C.W.M. and Storm, S. (2010), 'Feasible egalitarianism: Demand-led growth, labour and technology', in M. Setterfield (ed.),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Growth,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10] Storm, S. and Naastepad, C.W.M., "Wage-led or Profit-led Supply: Wages, Productivity and Investment", in: Lavoie, M., Stockhammer, E. (eds), Wage-led Growth: An Equitable Strategy for Economic Recovery,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100 - 124.
- [11] Lavoie, M., and Engelbert Stockhammer, Wage-led growth: concept, theories and policies,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No.41, ISSN 2226-8944, p.24.
- [12] Hein, E., Vogel, L.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 empirical results for six OECD countr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32 (3): 479-511.
- [13] Lavoie, M.,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debate on wage-led and profit-led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Policies: Intervention, 2017, 14(2), p.216.
- [14] 陈彦斌. 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落实：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视角[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1(06):94-100+156.